

* 專題演講 *

關於經、子結集諸問題

湯志鈞*

《四庫全書》的經部、子部，蒐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經學和儒家典籍。近年對這類經、史，時有新的結集。本文準備就接觸到的清季、民初結集的幾個問題，提出一些看法。

一

清季、民初結集的來源，較古代人物結集有兩點不同：一是手稿的存留；一是報刊的登載。

清季、民初人物，距離現在較近，他們的手稿尚有存留，這些手稿，有的沒有收入別人為他編輯或他自己所編的叢書，原因是由於作者後來思想發生變化，對早先之作，「既而棄之」。

康有為的《教學通議》過去未見刊佈，只是在《康有為自編年譜》「光緒 12 年（1886 年）丙戌，29 歲」中有這樣的記載：「又著《教學通議》成，著《韻學卮言》，既而棄之。」自稱有《教學通議》之作，但後來「棄之」。查康有為早年「大肆力於群書，攻《周禮》、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」等古文經籍和解經之書，至於今文經學的主要著作《公羊傳》，則「治經及公羊學，著《何氏糾繆》，專攻何劭公者」。知他早年信奉《周禮》等古文經籍，對今文《公羊傳》的何休注，卻曾「糾繆」。那麼，康有為早年是信古文、崇周公，而對今文專書則曾「糾繆」。但《何氏糾繆》，已「自悟其非，焚之」了。《教學通議》如有存留，將是探究康氏早年經學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。

*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，本文為作者於民國 86 年 12 月 4 日在本所二樓會議室所作的演講。

七十年代，我在上海博物館所藏康有為家屬捐贈的書稿中，逐卷細查，終於發現了這部手稿，確是他的早年字跡。《教學通議》刊目二十：〈原教〉、〈備學〉、〈公羊〉、〈私學〉、〈國學〉、〈大學〉、〈失學〉、〈亡學〉、〈六經〉、〈經亡〉、〈春秋〉、〈立學〉、〈從今〉、〈尊朱〉、〈幼學〉、〈德行〉、〈讀法〉、〈六藝〉上（禮）、中（射御）、下。內〈六藝〉下有目無文。另「缺目」三，即〈言語〉、〈師保〉、〈諫教〉。〈言語〉、〈師保〉「缺目」有文，正文另有〈敷教〉一篇，或即「缺目」中的〈諫教〉。全書約三萬八千字，上署「光緒十二年正月緝定」。

康有為在〈教學通議序〉中，標明撰書的目的是：「今天下治之不舉，由教之不修也」，「教學之不修」，「患其不師古也」。而所學只是「師古之糟粕，不得其精意」。認為「善言古者必切於今，善言教者必通於治」。《教學通議》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、言古切今。

「言教通治」，周公是典範。康有為認為，經書中的典章，都是「周公經綸之蹟」。「周公以天位而制禮，故範圍百世，萬民無不曲備」（〈六經〉）。「言古切今」，周公也是典範，他「熔鑄一時」，「以時王為法」，從而「制度美密，纖悉無遺，天下受式，遏越前載，人自無慕古之思也」（〈從今〉）。

周公「言教通治」、「言古切今」，是因為他不是空洞說教，而是「有德有位」，用以「綱維天下」。「周公兼三王而施事，監二代以為文」，「制作典章」，「因時更化」，從而「大周之通禮會典一頒，天下奉行」（〈從今〉），「教學大備，官師咸修」。

《周禮》是古文經典，周公是古文經學家崇拜的偶像，康有為講《周禮》官守，崇周公權威，並從周公「有德有位」著眼，恰恰是古文經師的立論所在，至於今文經學家則是尊《公羊》、崇孔子的。康有為既著書批駁何休，《教學通議》中對孔子也作如是評價：「孔子雖聖，而絀於賤卑，不得天位以行其損益百世，品擇四代之學，即射行明備，亦不過與史佚之徒佐翊文明，況生丁春秋之末造，天下失官，諸侯去籍，百學放黜，脫壞大半矣。孔子勤勤懇懇，遠適宗周，遍遊於列國而搜求之。」（〈六經〉）認為孔子「不得天位」，只是「搜求」遺文，退而講學。

周公、孔子對六經的關係也有不同，康有為認為：如今的六經「雖出於孔子」，而其典章皆「周公經綸之蹟」。過去六經都有官守，「以官為師，終身遷轉不改」，「如《易》出於太卜，《春秋》出於外史，《詩》出於太師，《論語》、《詩經》出於師氏」（〈私學〉）。但「自夷、懿以降，王蹟日夷，官守漸失」，孔子就是生於「失官之後，搜括文、武、周公之道，以六經傳其徒，其徒尊之，因奉為六經」的（〈失官〉）。那

麼，六經本是「周公之制」，孔子只是「搜括文、武、周公之道」，「憲章祖述，續承先王」(《六經》)。它和古文經學家之以孔子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又何其相似！

以周公為「有德有位」，以六經為「周公經綸之蹟」，康有為是尊崇周公的；至於孔子，他對經書的功蹟，則在於傳授六經、講明六經之道和「制作《春秋》」。然而，孔子處「王官失守」之時，「六經之治掃地」之際，他只是「續承先王」，講明其道。他寫《春秋》，也是因「六經之治掃地」，從而「感亂賊，酌周禮，據策書，明制作，立王道，筆則筆，削則削」的。其中自有所謂「微言大義」，而「孔子微言，質之經傳皆合」，他講《春秋》之治，也只是「繼周」，尊的還是周公。

如所眾知，康有為是利用今文經學議政言事、進行變法活動的；但他早年卻是尊周公、言古文。《教學通議》手稿的發現，不但可以弄清康有為思想演變的跡象，尋求言政依附的艱辛，並且可以證明他的援用今文，是在第一次上書不達以後，是在受到廖平啓示以後；還可以看到，康有為的援經言事，尊孔改制，是為了政治的需要。那麼，手稿的發現，對研究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演變、發展是何等重要。儘管康有為後來思想變了，「既而棄之」，但如再結集，還是應該收入的。

二

近代報刊盛行，一些政治活動家、思想家，每每跟隨社會、政治、經濟情況發表政論。但有的自己沒有結集，有的在流傳中散佚，致不為人所注視。例如章太炎的〈諸子學略說〉，發表在《國粹學報》第二年丙午第8、9號，1906年9月8日、10月7日（光緒32年7月20日、8月21日）出版，署名章絳。而章太炎自己編的《章氏叢書》，卻沒有輯入。

章太炎為什麼在輯集時不收〈諸子學略說〉？不是因為此文軼失，而是因為當時「深惡長素（康有為）孔教之說，遂至激而詆孔」，繼而悔之，從而把它刊落的。

〈諸子學略說〉首謂：「蓋中國學說，其病多在汗漫，春秋以上，學說未興，漢武以後，定一尊於孔子，雖欲放言高論，猶必以無礙孔子為宗，強相援引，妄為皮傅。愈調和者，愈失其本真；愈附會者，愈違其解故。故中國之學，其失不在支離，而在汗漫。」接著，對儒家、道家、縱橫家、法家等加以說解。論儒家時，說「儒家之病，在以富貴利祿為心」。孔子教弟子，「惟有成就吏材，可使從政」。還說「孔子之教，惟在趨時，其行義從事而變」，以至「孔子譏鄉愿，而不譏國愿，其湛

心利祿，又可知也」等「批孔之辭」。

〈諸子學略說〉發表後，章太炎弟子黃侃曾向他責詢，文中「孔子竊取老子藏書」出自何典？章氏只是支吾其辭。此後，這篇文章沒有收入《章氏叢書》。

到了1921年，柳詒徵在《史地學報》第1卷第1期發表〈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〉一文，對〈諸子學略說〉加以批判。章氏見到後，回覆柳詒徵，略謂：

頃於《史地學報》中得見大著，所駁鄙人舊說，如云「孔子竊取老子舊書，恐被發覆」者，乃十餘年前狂妄逆詐之論，以有弟兄啼之語，作逢蒙殺羿之談，妄疑聖哲，乃至於斯。是說向載《民報》，今《叢書》中已經刊削，不意淺者猶陳其芻狗，足下痛與箴砭，是吾心也。感謝感謝〔……〕

鄙人少年本治樸學，亦唯專信古文經典，與長素輩為道背馳，其後深惡長素孔教之說，遂至激而詆孔。中年以後，古文經典篤信如故，至詆孔則絕口不談，亦由平靜靚論，深知孔子之道，非長素輩所能附會也。而前聲已放，馳不及舌，後雖刊落，反為淺人所取。^①

應該說，對過去文章偶有失實，進行糾正，這是可貴的，也正是信奉古文的「樸學」實事求是的風範。但當年他批判康有為（長素），卻是生氣勃勃的，如今卻因前文失檢，深感「前聲已放，馳不及舌」，而不收入《叢書》了。

信中所稱「向載《民報》」，實際載於《國粹學報》。自稱「《叢書》中已經刊削」，說明章太炎在結集時是因為過去「激而詆孔」，自感「狂妄逆詐」，自行刊削的。自行結集，將舊作抉擇刪落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清季以前作者，也不會將舊作盡行搜入。但近代報刊所載，每有根據當時形勢，有感而發，這類文章，針鋒相對，對研究者思想發展，極為重要。我認為，如果沒有結集的，應該輯入；已經結集，內容有較大增刪的，應該校注。就以章太炎來說，所撰〈客帝〉，最早發表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1899年3月12日，旋又發表在日本《清議報》（光緒25年4月出版）。前者署名「章炳麟」，後者署名「臺灣旅客來稿」。收入《旭書》原刻本時，增改頗多，如「自古以用異國之材為客卿，而今始有客帝。客帝者何也？曰：蒙古之主支那是也」。《旭書》原刻本作「客帝者何也？曰：滿洲之主震旦是也」。改「蒙古」為「滿洲」，易「支那」為「震旦」，並在「而支那曠數百年而無君也，如之何其可也」下，增加

^① 章太炎：〈致柳翼謀書〉，《史地學報》第1卷第4期（1922年8月），收入拙編：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），頁763-765。

了一千五百餘字，續予發揮^②。他揭露了清政府「奉表以臣敵國」的媚外醜態，指斥清朝統治者對各族人民的殘酷剝削，提出「逐加於滿人，而地割於白人，以是為神州大治」。開始提出「逐滿」的口號。

〈客帝〉認為，滿洲貴族入主中國，是「客帝」。中國的「共主」，應是「仲尼之世胄」。說是只要清朝皇帝承認過去民族壓迫的錯誤，擁護孔子後裔做中國的「虛君」，自己退居為齊桓、晉文般的霸主，發憤自強，那麼，反滿情緒可以平息，可以防止「逐加於滿人，而地割於白人」。他在文章中，不但也談「素王」，還引《中候》和《春秋繁露》，說明他還未擺脫康、梁的思想影響。這種「客帝」的論調，也是章太炎後來所說「紀孔保皇」的表露。這點，他自己也不否認：「自戊、己違難，與尊清者遊，而作〈客帝〉，飾苟且之心，棄本崇教，其違於形勢遠矣。」^③

這一段話，是章太炎寫在後來寫的〈客帝匡繆〉上，作為《煊書》重印本的〈前錄〉刊發的，辛亥革命後，他手訂《章氏叢書》，把《煊書》改為《檢論》，卻把它刪除了。那麼，如果把《煊書》最初在報刊上發表的編入，再將此後多次改動輯錄彙刊，無疑對研究章氏思想發展、演變是非常重要的素材。因此，我認為儘管他已自行結集，但搜輯尋求，校訂編集，也是必要的。

三

手稿的發現，可以尋求人物的思想演變發展；報刊的登載，可以考察人物在一定條件下的針鋒相對。經、子結集，對手稿、報刊文獻不容忽視。但一經整理，也有幾點可資探究：

(一)、手稿多次修訂的處理：

有些手稿，曾不止一次地進行修改，這些修改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時期的思想演變。如果只收最初的結集，不易看到他在結集前的增訂緣由；如果只看後來的結集，可能有的文篇已經刪除。如上面提到的《煊書》，我就看到不止一次的修訂手稿。

戊戌政變後，章太炎旅居臺灣，曾將已刊、待刊論文，彙成《煊書》，共五十篇，

^② 見拙編：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，頁 89-90。

^③ 章太炎：〈客帝匡繆〉，《煊書》重印本〈前錄〉。

於1900年（光緒25年12月）付梓，這是《煊書》最早的刻本（即「原刻本」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影行），對早先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篇，已有較多增改，如〈客帝〉。1900年，在義和團運動發生和自立軍失敗的影響下，思想發生變化，寫〈客帝匡謬〉，並校訂《煊書》。這部「手校本」，列〈原學〉第一，到〈解辮髮〉第五十七，另附〈客帝〉，實為六十四篇。「手校本」的存目和部分新增文篇手稿，今藏上海圖書館。

1902年6月，章太炎由日本返國後，又在1900年《煊書》手校本的基礎上重行「刪草」。是年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譜》。稱：「余始著《煊書》，意多不稱，自日本歸，里居多暇，復為刪草傳於世。」這就是1904年在日本東京翔鸞社的鉛字排印本。

1910年，章太炎在日本，「對《煊書》亦多所修治矣」，增訂了不少篇文，也刪除了一些篇目，如擬增〈原儒〉、〈原經〉、〈六經說〉、〈小疋大疋說〉、〈八卦釋名〉、〈孝經說〉等自認為「閎雅」的傳世之作。這部「手改本」改筆都是蠅頭小楷，今藏北京圖書館。

1913年8月，章太炎「時危挺劍入長安」，為袁世凱幽禁，將所撰論著編成《章氏叢書》，1915年由上海古文出版社排印出版。不久，又由浙江圖書館木刻刊行。其中《檢論》，就是在《煊書》「手改本」的基礎上修訂印行的。從編目到內容，和原來的《煊書》都有顯著不同，我在《章太炎年譜長編》和《章太炎傳》中，都曾論及^④。

如果單看《章氏叢書》中的《檢論》，不但刪除了過去《煊書》中的一些革命文篇，而且看不到他自甲午戰後到民國初年的思想演變。如果「結集」能把他的歷次改本，一一搜集影行，那對深入研究章太炎思想，以至中國近代史，無疑是有幫助的。

或者以為，清季以前的結集，很多是作者晚年自訂，他們對早年之作，也會有增刪、修訂，為什麼近代人物結集要如此細緻，豈非繁瑣。其實，占有資料，繁瑣非罪，問題是結集的目的何在？作為「全集」，總希望搜編齊全，清季距今較近，手稿存留，這是一件好事，不將這些作品搜輯齊全，怎能對作者作出正確評價？況且在歷次修訂的手稿中，可以察覺各該時期作者的思想活動及其周圍環境，以至人物的關係，這是不容忽視的。況且，近代社會發展迅速，人物思想每隨時代而有變化，

^④ 拙撰：《章太炎年譜長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10月）；《章太炎傳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6年10月）。

這和鴉片戰爭以前的社會自有不同，思想的演變，修訂的頻繁，自非過去人物「結集」可比。

當然，在處理手稿以至刊本進行結集的時候，帶來一些困難，如以初稿為底本，以歷次修改腳注、正文、注文檢查不易；如以歷次改本照錄，讀者又必重新勘覆。究竟採用何種方式為好，可以探討。但不能因為編校困難而任意放棄。作為近代人物的「結集」，對這宗比較重要而歷經修改的文篇，還需慎重對待，不能棄而不顧。

其實，報刊發表的文篇在結集時又經修改的情況，近代人物也不只是章太炎一人如此，其他人物也時有所見，如嚴復〈原強〉一文，最初登載光緒 21 年 2 月 8 日至 12 日（1985 年 2 月 4 日至 9 日）的天津《直報》，後來收入《侯官嚴氏叢刻》，前後就有很多改動，除《物類宗衍》改為《物種探原》等名詞改動外，很多牽涉詞意的改動，如《直報》載：

故非為天、地、人三學，則無以盡事理之悠久博大與蕃變也，而三者之中，則人物為尤急切，何則？所謂群者，固積人而成者也。不精於其分，則未由見其全；且一群一國之成之立也，其間體用功能，實無異於生物之一體。

《侯官嚴氏叢刻》則作：

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。蓋於名數知萬物之成法，於力質得化機之殊能，尤必借天地二字，各合而觀之，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蹟。名教虛，於天地徵其實，力質分，於天地言其全，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，雜物之博大，與夫化物之蕃變也。雖然，於群學猶未也。蓋群者，人之積也，而人者，官品之魁也。欲明生生之機，則必治生學；欲知感應之妙，則必治心學。夫而後乃可以及群學也。且一群之成，其體用功能，無異生物之一體。

可知修改異同，勘校探尋，還是必要的。

（二）、來源不一的考核：

譚嗣同的《仁學》，最初刊登在《清議報》和《亞東時報》，但他們不是同源。戊戌政變後，梁啟超流亡日本，創刊《清議報》，自第 2 冊起（光緒 24 年 11 月 21 日，即西元 1899 年 1 月 2 日）開始刊登，直到第 100 冊（光緒 27 年 11 月 11 日，即西元 1901 年 12 月 21 日）刊完，共登載十三次，歷時近三載。較《清議報》略後，在上海發行的《亞東時報》，自第 5 號起（光緒 24 年 12 月 20 日，即西元 1899 年 1 月

31日)連載《仁學》，至第19號(光緒26年1月30日^⑤，即西元1900年2月28日)刊完，共登載十四次，歷時也有一年零兩個月。但他們不是同源：《清議報》本源自梁啟超所藏「副本」，而《亞東時報》則源自唐才常。1091年10月10日，由國民報社出洋學生署名，在日本發行之本，以至後來各本，都沿自梁啟超所藏「副本」。早在六十年代初，我就建議「重印《仁學》，應以《亞東時報》本為依據，而將各本比勘」^⑥。中華書局重印的《譚嗣同全集》就曾按照這一意圖進行，並從《湘學報》、《湘報》、《時務報》、《農學報》、《清議報》、《亞東時報》增補和校訂了一些文篇。

至於沒有在以前結集登載的，也應補輯，如唐才常有《覺顛冥齋內言》，收錄他在戊戌前的文篇。政變後，他續在《清議報》、《亞東時報》發表詩文，如〈論戊戌政變有益於支那〉、〈答客問支那近事〉、〈砭舊危言〉、〈日人實力保華論〉、〈正氣會序〉等，都很重要，即戊戌前的函札，《覺顛冥齋內言》也未收錄。重編的《唐才常集》，也把這些補錄進去了。

清季、民初報刊的尋求，並不那麼容易，但不能由此忽視。只有比較全面地、系統地掌握資料，才能編成真正的「文集」或「全集」，只有比較全面、系統地掌握資料，才能對各該人物有一正確的評價。

四

清季、民初人物結集，在如何寫好前言或後記，以及編排、標校等方面，也有幾點值得注意：

(一)、前言或後記，應力求簡明、扼要、穩定：

作者生平、著作情況、版本依據、編集源由，可在前言或後記中說明，但不要「趨時」。

^⑤ 按光緒26年正月，無「30日」，參以該號《亞東時報》報端另署「明治33年2月28日」，則「30日」，應為「29日」之誤。

^⑥ 拙撰：《〈仁學〉版本探源》，《學術月刊》1963年第5期，收入《康有為與戊戌變法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10月)，頁301-328。

經、子結集，是要傳之久遠的，「前言」或「後記」就不能隨當時的政治形勢而作「趨時」之論。舉例來說，《龔自珍全集》在1959年出版的，1974年重印，重新改寫了「前言」。改寫的「前言」說是龔自珍從劉逢祿學公羊學是在二十八歲以後，斷然說是他與「公羊學無關」。事實上，龔自珍從劉逢祿學公羊學確在二十八歲，〈明良論〉、〈乙丙之際著議〉諸文，也寫在二十八歲以前；但不能說他與「公羊學毫無關係」。因為：

1. 龔自珍同時期的人和受他影響的人，都強調他「好今文」。魏源說他「於經通《公羊春秋》」^⑦，梁啟超說「段玉裁外孫龔自珍，既受訓詁學於段而好今文，說經宗莊（存與）、劉（逢祿）」，以為他是「今文學派的開拓者」^⑧。夏曾佑贈梁啟超詩也說：「璣人（龔）、申受（劉）出方耕（莊），孤緒微芒接董生（仲舒）。」即所學與之殊科，學宗古文的章太炎，也說龔自珍「亦治《公羊》，與魏源相稱譽」^⑨，都承認他與今文經學的關係。

2. 公羊學的特點是援「三統」、「三世」以言變革，它每易為隱憂國事、期待復革的人所接受，龔自珍年輕時就有「經世之意」，二十八歲以前的著作中，也有跡象可尋。如〈乙丙之際著議第七〉，從夏、商、周三代「夷興」指出：「我祖所以興，豈非革前代之敗耶？前代所以興，又非革前代之敗耶？」有夏、商、周因時損益的微義。〈乙丙之際著議第九〉：「吾聞深於《春秋》者，其論史也，曰書契以降，世有三等，三等之世，皆觀其才。才之差，治世為一等、亂世為一等、衰世別為一等。」談到「三世」，不能說它和《公羊》毫無淵源。

3. 乾隆、嘉慶年間，今文經學異軍突起，「翻騰一度」，莊存與揭櫫於前，劉逢祿、宋翔鳳推衍於後，形成「常州學派」。莊、劉久宦京師，里第也與龔自珍相邇。龔自珍於十一歲隨父到京，此後屢來京、蘇，對復興的今文經學和莊、劉行事應有所聞。1817年，當龔自珍二十六歲時，寫有〈江子屏所著書序〉，有講三統循環論的跡象。同年冬至，看了江藩的《漢學師承記》，認為以清代經學為「漢學」，「名目有十不安」，其中一條：「本朝別有絕特之士，涵泳白文，創獲於經，非漢非宋，亦唯其是而已矣，亦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」，宜指清代經今文學的開創者莊存與而言。他

⑦ 魏源：〈定齋文錄序〉，《魏源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），頁239。

⑧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。

⑨ 章太炎：《煊書》第十二，〈清儒〉。

對「創獲於經」的「絕特之士」是有所知的。就在遇到劉逢祿的前一年，莊存與之孫綬甲館於龔家，為龔自珍「言其祖事行之美」，龔自珍即擬為寫碑銘。次年，從劉逢祿受公羊學，並識宋翔鳳。如果他對今文經學毫無品味，不會一遇到劉逢祿，即從之受學。也正由於從小有「經世之意」的思想基礎，從而甫經遇劉，即從之受學，譽今文經學為「開天下知古今之故」之學，並在自己的著作中，顯露了今文的「微言」、《公羊》的「奧義」了。

龔自珍受今文經學的薰陶是事實，他在二十八歲以前已和今文經學有關也是事實^⑨，為什麼《龔自珍全集》重印時，「前言」視而不見，特地加「與公羊學無關」這一段呢？查此書重印是在1974年，正是四人幫鼓吹儒法鬥爭之時，他們把龔自珍定為「法家」，從而在書籍難於出版之時，會把此書重印，如果說龔自珍和「公羊學」有關係，如果說他受了常州今文經學的影響，豈非要影響龔自珍的「法家」地位？它特地加上這一段，不是沒有源由的。但序文的「趨時」，卻影響了《全集》的發行，可知「前言」或「後記」還是穩定為是。

(二)、編排、標校諸問題：

結集編排，應該根據材料的特點，力求保持資料的完整性為原則，不能任意取捨，主觀編排。一般說來，「全集」中的專書，可按專書編入；「全集」中的單編詩文以至奏稿、函電，可按年月編排。如果自出「專題」，那麼奏札函電，每每不是專言一事，勢必任意取捨，顧此失彼。同時，檔卷、手稿整理時，還應與文物保管相結合，因為這些畢竟是近百年、甚至百年前的文稿，稍有不慎，即易帶來研究時的困難。如有的函札，原有信封，郵票上有時日可稽，未加注意，甚至丟失，對考定時間、地點會帶來極大困難。

當今重行結集，自宜進行新式標點。我認為標點時首先要弄清文義，辨明句讀。其次，有的文稿，曾自行斷句，應予注意，如章太炎的〈客帝匡謬〉，最後一句「著之以自劾錄當棄市」。有人在「劾」下加點，而章太炎手校本則自己在「劾錄」下加點，自宜按照作者原意進行標點。至於校注，宜力求簡明，避免讀者知道的去注，該注的卻不注。過去引文，每憑記憶摘錄，似加引號即可，不必另將原文注出，總

^⑨ 參見拙撰：〈龔自珍與經今文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1980年第4期，收入《經學史論集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5年6月），頁111-133。

之，編排力求合理，標校力求簡明。

近年海峽兩岸頗多經、子結集，因草此文，供討論參考。

1997年5月31日 於上海